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第二版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刘军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第二版

A General Histor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刘军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刘军平著. —2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4
ISBN 978-7-307-20853-7

Ⅰ.西… Ⅱ.刘… Ⅲ. 翻译理论—语言学史—西方国家 Ⅳ.H05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5207号

责任编辑:谢群英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9　字数:925千字　插页:2
版次:2009年9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2版
2019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853-7　定价:8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刘军平，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任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翻译理论、诗歌翻译、解释学及中西比较文化；现任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本科专业教学协作组成员、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CATTI）、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执业能力培训与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常务理事、联合国语言人才培训体系专家委员会专家成员(UNLPP)、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文化中心主任等；刘军平教授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998-2000）任高级访问学者，赴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任美国国务院富布赖特基金研究学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香港浸会大学任香港田家炳基金会访问学人计划学者（Tin Ka Ping Foundation Mainland China Visiting Scholar）。近年来，先后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西东大学、库兹城大学、威斯里安大学、中国港澳地区大学与祖国内地等大学作百余场学术讲座；现任国内10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先后在《中国翻译》、《翻译教学与研究》、《外国语》、*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10余篇，出版专著及编著20余部，翻译出版译作数百万字。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多家媒体包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光明日报》、《东方翻译》、凤凰卫视中文台及美国《世界日报》等转载和报道。学术著作分别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获国家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湖北省教育厅彩虹学者、武汉大学第五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

修订版前言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说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文明起源一同诞生。说它年轻，是因为正式作为一门现代学术分野的学科得到确立，还是20世纪后期的故事。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风东渐，掀起了向西方学习、借鉴的热潮。国内翻译理论界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引进了等量齐观的西方翻译理论著作。通过借鉴和会通西方翻译理论，在我国，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在21世纪的晨曦中喷薄而出。

目前，在国内的外语教育体制中，翻译学在招收和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方面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链条，翻译专业已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中的一门颇受欢迎的新兴专业和学科增长点。自2006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设立翻译本科专业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外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及浙江师范大学等先后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至此，有近281所大学获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翻译本科学位的设立是我国翻译学科专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为“翻译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英文缩写为MTI)，有15所高校申办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截止2019年4月，全国共有249个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42个翻译学博士培养单位。在海外，从20世纪60年代起，“翻译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200多所大学都有翻译专业或方向，香港有7所大学设置了翻译专业或方向，海外形成了较完整的翻译学教育体系链条。国内外已经设置的翻译专业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培养手段等各个方面，为学者们从事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就国内外大环境而言，已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基础。

随着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步伐的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成为一股热潮，我国的对外交流的需求日益增多，翻译成为新时代对外传播的聚光镜、凝聚剂、推进器，因而高端翻译人才尤其是双语娴熟的口笔译人才，成为社会和市场的急需。

在外语院、系中，无论是外语专业、翻译专业或对外汉语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是翻译方向的教师，研习西方翻译理论成为他们教学和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学习翻译学需要对日新月异、蔚为壮观的西方翻译理论资源有所了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涉及西方翻译理论，就一定会涉及西方翻译学派及其发展脉络。本书试图对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作一钩沉，探究和梳理其主要发展脉络和流派，列举代表性的人物和主要翻译观点，勾勒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成就。因此，本书试图回答如下问题：怎样划分现代翻译理论的不同阶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哪些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其理论有哪些显著特点？又属于哪一流派？西方翻译理论和它们的这些流派，对当代中国译学研究有什么借鉴作用？学派与学派之间有哪些渊源和观点上的异同？目前，在海内外，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模式和现状如下：

结合翻译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烈·勒菲费尔(1998)两位“文化学派”的学者提出的“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及“施莱尔马赫模式”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三个典型翻译模式。埃德温·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1993)中，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发展态势和研究方法，把当代译论划分为五大流派(1)美国翻译培训派；(2)翻译科学派；(3)早期翻译研究派；(4)多元体系派；(5)解构主义派 。这种谱系划分强调在权力、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翻译操纵，这种操纵体现在翻译上就是翻译的改写。在这种划分中，前两个流派主要介绍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包括奈达在运用乔姆斯基生成转换语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翻译科学。这种划分充分吸收了法国、德国、荷兰、东欧及以色列等国家的翻译理论成果，试图将其包容在不同的流派下予以讨论。香港翻译理论研究学者张南峰、陈德鸿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2000)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按照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六大学派，并为每一学派的代表性文章撰写导言，把部分文章翻译成汉语。铁木志科将 20 世纪出现的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1)诗人和翻译，即翻译场学派；(2)哲学和语言学派；(3)功能主义学派；(4)描写翻译学派；(5)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翻译观；(6)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国内的李文革(2004)把西方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同时从类型上划分了 7 个流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起，西方各种翻译理论、各种流派已陆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经过近 40 多年的吸收、消化，其中许多理论已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所用。不仅如此，我国学者通过反思、批评西方译论，与西方学者对话，反过来促进了西方译论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几种划分基本上包含了现代西方翻译的主要流派。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翻译流派或学派的划分比较复杂。同一位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属于不同的流派，例如奈达也可以说是属于科学学派、语言学学派或者社会符号学学派。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学科之间、学派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这种交叉和相互联系使得价值判断变得较为不容易。不仅如此，不同学派的观点及其理论建构有一个有待时间的检验、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作者认为，没有一种翻译理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翻译问题。一种学派只能从一个侧面描述说明翻译现象和行为，对翻译的复杂关系作出探讨。我们要看到某种学派之洞见，也要了解其盲点。在翻译研究中做到，触类旁通，知己知彼。尽管如此，国内按照学派来系统地阐释西方翻译理论的专著和教材还不多，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就国内翻译研究本身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集中力量，进行学科规划和规范，完善学科发展体系，而这一切最急迫的是应该明确系统地提出翻译

学的学科建设范畴，以深化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自不待言，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系统阐释和评价显得迫在眉睫。

如何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构思、编纂出有学术价值的翻译理论通史的著作，如何评判和借鉴国内外翻译学界已编写和出版的西方翻译史和翻译理论成果，是国内翻译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世纪中国当代翻译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必须重视通史通论研究，通史研究更注重对翻译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它涵盖更悠久的历史年代，更多的人物流派；通论研究则更注重对翻译理论概念演进的历史进行概括，从更广阔的论域范围，发现其复杂的思想关联和作形而上的理论思考。因此，撰写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是一项有意义的系统工程。国内翻译学界为填补这个空白，作出了很大努力。

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从古代到当代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路线图。通过挖掘西方翻译理论学派的形成根源，梳理其历史发展轨迹，彰显其特色，探讨其成因，剖析其得失，总结其理论意义。

自 2009 年本书推出以来，就受到了业界人士，院校师生的喜爱和肯定。大家一致认为该书内容翔实、参考价值高，本书系统地对西方从古至今的翻译学说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讨论。此次修订版，除了对本书存在的不足进行查漏补缺和不断更正完善，特别增加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外国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反思”一章内容，全面总结了外国译论的引进和研究成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作者尝试尽其一己之力，为西方翻译理论在国内的接受和融合作出绵薄的贡献。

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就西方语言文化变迁下的翻译理论问题进行历时与共时、实证与规范、分析与综合研究。遵循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学派与个案相结合、横断与纵向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历史研究与描述研究相结合、典型个案分析与宏观阐释相结合等方法，对西方翻译理论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系统探讨，力争做到视角拓新。

二、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本书试图把握西方翻译理论各个学派的起源、发展规律、核心意义和内在发展轨迹，对西方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理论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突出研究西方翻译理论作为构建当代翻译理论范畴的有机部分，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总体发展历史。国内此类研究要么纲要式地、线性式地介绍西方翻译历史或理论，要么，以国别或某一地区来阐释西方翻译历史或理论。本书跨越了地域性研究的局限，从整体角度来梳理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与理论流派。

三、史论结合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本书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序来写，跨度从上古到当代，但以翻译流派和翻译理论家的观点为主要线索来论述。具体来说，本书力图做到：

(1)追溯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和文化根基及成因；

(2)解析西方翻译理论各个学派的结构和表现特点；

(3)探讨西方翻译理论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生平、理论特点；

(4)提出对西方各个翻译理论学派的评价。

融描述与论说为一体，需要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综合能力(大视野)。这种综合研究的价值在于，将不同流派、学派的观点分门别类，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为经，以历史时间

为纬，同时结合个案研究，以证实其理论的适用性和普遍性。

四、本书涉及的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全书共有十四章加上绪论，内容涉及不同国别、不同流派的翻译理论。具体包括：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与流派划分，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融合与创新，西方翻译史的分期等；古代文明与人类早期的翻译活动，中西名实的起源与比较，西方早期的翻译活动；《圣经》翻译的不同译本比较，古罗马文学翻译等；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翻译的民族与世界视野；翻译的语言学派，霍姆斯译学的基本构想等；翻译的文艺学派，创造性阐释的翻译理论，现实主义文学翻译观 ，解释学的翻译观等；翻译的哲学学派，翻译征服论，解构主义翻译观，文化相对主义的翻译观等；翻译的功能学派，语境翻译模式等；多元系统及规范学派，范式与系统的翻译理论；翻译的目的论学派，文本类型与翻译，纪实型翻译与工具型翻译等；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对翻译学科范式的改写；女性主义翻译观，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学；后殖民翻译理论，东方主义的记忆与翻译，翻译的混杂性与民族叙事等；外国评论的引介与反思，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西译论的比较与融通等。

全书结构安排层次清晰，符合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基本历史状况。第一章，主要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外国译论进行了引介和反思，并思考翻译理论未来发展的走向。随着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立，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翻译学科将承载着丰富的信息载体，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和使命，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三、四章叙述的是古代翻译活动，主要以翻译史为主，第五章涉及的是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作为一个主题，以往很少被翻译界拈出。第六章到第十四章是现当代翻译历史和理论，共分为九大学派或九个大的主题：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的文艺学派、翻译的哲学学派、翻译的功能学派、多元系统及规范学派、翻译的目的论学派、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女性主义翻译学派、后殖民翻译理论学派。在古代部分，本书从中西文字的起源、翻译的名与实、不同类型的翻译谈起，依照时间顺序追根寻源，脉络清晰，叙述清楚。在现代至当代的学派（流派）中，每个大的学派之下再分出小的专题，即对具体翻译理论家的译论作详尽探讨，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即像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提出的“龙虫并雕”，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和梳理西方翻译史料的理论学派。

在本书的古代部分中，注重中西翻译史料的搜集与对照。研究古代西方翻译历史，把中国的古代翻译历史作为一个“他者”和“镜子”，来反照西方内容，反而看得更清晰。理解西方，中国是个很好的“外来之眼”。通过翻译的起源，可以看到翻译在华夏民族语言文化史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间的语文翻译（语内翻译）可以与西方语际翻译联系起来阅读，即把华夏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与西方文字与早期翻译活动对比阅读，即可以窥见西方各民族之间的翻译概况。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拓展“翻译”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证明华夏民族的翻译实践同西方其他各民族的翻译活动一样，历史悠久，是整个文明、文化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与华夏民族的语言翻译活动一样，西方的语言翻译活动也呈现一种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从而说明各民族语言的接触和翻译，也是一种文化上互通有无，互相学习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任何文明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等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岁月，但这些文明随着历史消亡了，但是，这些文明都通过翻译这种长生不老之药，将各自的文

化传承较好地保存了下来。翻译之功，善莫大焉！

五、本书在充分借鉴海内外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把握西方翻译理论中各个学派的概念范畴及其核心观点。在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弄清西方翻译理论各学派的起源及传承方式。在对西方翻译理论各个学派的关键概念范畴予以评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胡话胡说”(即由西方人阐释西方翻译理论观点)，变为“胡话汉说”(中国人对西方翻译理论及学派的批判和评价)。

但是，这种“胡话汉说”决不是文化排外主义，中国翻译研究的出路还在于融合中西翻译理论之长。笔者认为，吸收外来译论只会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译学资源。陈寅恪先生在论证吸收外来文化的必要性时说：

>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2~253页。)

这一段话里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对外来文化，盲目输入，机械吸收，必然会昙花一现。只有使吸收外来文化与保存本土文化相辅相成，把外来文化加以“变易”，它才能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吸收的过程是十分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在“格义”、“反向格义”和“双向格义”之间，两种文化要经过互相撞击、互相较量、互相适应、互相融合等阶段，最后才能吸收。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外来文化必须撞掉与本土文化中不可通约的那一部分，然后才能被接纳。中国译学研究概莫能外。它必须立足于本土，积极“吸收外来输入之学说”。它必须改变旧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改变旧的译学范式以建立新的模式，改变旧的研究方法以采用多元客观的方法，达到“返本开新”的目的。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通过“格义”成功地吸收消化、融合、发展了异域文化，现在，我们也有信心通过创造性转换开创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译论。毫无疑问，这种融合中西之长的创新的译学模式，代表着未来中国译学的发展走向，也代表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澎湃大潮。

具体来说，本书的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史论”结合，“以史带论”或“以家带论”，史和论有部分交叉、重叠。一是翻译活动与研究相结合，二是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每个翻译理论家成为一个小的专题)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是由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所决定的。西方数千年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且卷帙浩繁，为我们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而翻译实践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反过来，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对翻译理论及其描述会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在概念的把握和提炼、语句的表述和文风等方面。作者力图做到，在论述中坚持术语的清晰、精确和规范等特点，同时注意从汉语言和汉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将翻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与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既有微观的、量化的研究，也有宏观的探讨。在研究内容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各个学派作较大规模的

实证性、系统化研究。在研究结果上，尝试建立起中国人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评价体系。通过清理体系的基础，各种有代表性概念、范畴和术语，在各自的体现中得到澄清。就翻译理论史而言，史实是否梳理得细致，线索是否提供得清晰，问题意识是否敏锐是衡量著史成功的关键，作者在这些方面也作了沉潜钩索。

自19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迅猛，有其独特的规律性，呈现出独特特点。殆至新的世纪，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新理踵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西方翻译理论家们对西方的翻译实践，或探微发幽，或高屋建瓴，从结构主义、功能学派、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后现代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契入翻译理论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总结。这些总结对我们认识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识和把握西方翻译学的本质及其内在发展脉络，更好地开展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国内学者对西方译论的解读和评判在点面上比较集中，但相对来说不太系统，并且某些部分的研究跟不上西方翻译理论“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创新理论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缺少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去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自觉，盲目地跟随西方。以西方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学术，以中国翻译实践来验证西方翻译理论的普适性。不少人还是跟在外国学者后面“照着讲”，从而造成我们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缺少自己的建树，完全脱离中国语境，形成了国内的翻译研究不能与西方对话的局面。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应该从“接着讲”和“照着讲”，进而进入“自己讲”的自主创新阶段，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的期望。

(2)不把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看做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当做简单的介绍和评述，个别学者在自身还没有完全理解原著的情况下，对西方理论作出武断性的价值判断。或者在编写教材时，全盘照搬原文。无论是“洋话洋说”，毫无自己的阐发，还是“自说自话”，即用中国的概念范畴去“格义”西方话语，形成了一种“非西非中”的特殊东西，其结果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3)国内翻译研究存在“理论即实用”的误区，仿佛学习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就是仅仅为了指导翻译实践。实际上，不少西方翻译理论是“超语言”的、纯粹思辨性质的，如本亚明的翻译理论观。这些理论是“无用之大用”，不能用急功近利的眼光来学习这些理论。翻译研究中的形而上的思考带来的是视野的开阔，观点的洞见。需要澄清的是，有些纯思辨的翻译理论并不能直接指导翻译实践。

相比较而言，一方面，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基本上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国内传统上把翻译学按照学科划分在语言学学科之下，而语言学学科在中国是强势学科，历史较长，也有自己成熟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翻译学就越来越处在一种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夹缝中艰难生长的局面，作为一种跨学科性很强的学科，显得发育不够成熟。在意识到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在国内的局限和尴尬局面，本书力图做到将西方翻译理论说透，为中西翻译理论的融通与新生提供新的参照系。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翻译理论，也应该奉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径路。“博学之”就是要广泛地接触各种西方理论著作的原典(原文经典著作)，对不同的翻译理论思潮和观点兼容并蓄，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审问之”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并对所学加以怀疑、诘问。

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critique)是学问的起点，也是做学问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慎思之”，有了批判的眼光之后，还要仔细分析、梳理，试图找到正确的路径；“明辨之”，指说明是非，判断命题的真伪，比较理论观点的异同；“笃行之”，指理论的融会贯通和“知行合一”，学问之道，弄懂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本书的撰写也是作者长期从事翻译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个小结，它倾注了作者对西方译论的独特思考。的确，真正的思想建构是孤独的灵魂锲而不舍地涵泳出来的。虽然本书的写作只延续了几年时间，但30多年来作者没有停止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思考。作者先后求学任教于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珞珈山，问学于学术殿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虽然学术研究还谈不上登堂入室，但时刻受这些名校厚重的学术氛围的浸淫。“自强 、弘毅、求是、拓新”(武大)，“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d Magis Amicus VERITAS. 拉丁文)(哈佛)，“追求真理和光明”(Lux et Veritas)(耶鲁)的校训鲜明地体现出这几所我学习过大学的为学理念，这些校训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治学。

同时，本书的撰写始终得到海内外学界同仁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仲伟合教授、穆雷教授、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武汉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谢群英社长、武汉大学的郭著章教授，以及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的各位同仁学者在我的治学路上给予了不少帮助，他们亦师亦友，鸿雁传书或谈话主题不离译学之道。在美国，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学者，与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孙康宜教授、比较文学系的苏源熙教授(Haun Saussy)的交往，使我了解到了中西比较诗学之道，聆听耶鲁大学布罗姆教授(Harold Bloom)和哈特曼教授(Geoffrey Hartmen)的高谈阔论，让我对解构主义、经典的解读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哈佛大学的后殖民大师巴巴教授(Homi Bhabha)“坐而论道”，让我“读其书，知其人”，对翻译、后殖民、种族、混杂性的关系看得更清楚。武大的郭齐勇教授是我问学之道的楷模，“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为人为学的统一。家人和朋友常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和鞭策。刘允立、刘逸飞在收集整理资料和文字输入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我表示诚挚的谢意。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初版的撰写还得到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项目编号[2009]011)以及武汉大学“985工程”二期拓展平台《比较哲学与中西文化建设》项目的资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英文系历届研究生和博士生们，在课堂上与他们讨论西方翻译理论是一大享受，通过教学相长，如切如磋，作者的脑海里时常闪现出碰撞的火花。人生理想境界莫过如海德格尔式澄明地、诗意地栖居，或是进入老夫子的理想境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本书既是为我的这些研究生而写的，也是为大专院校外语专业本科生、翻译方向研究生们而写的。同时，也可作为翻译理论研究学者的参考资料。

由于西方翻译理论论著浩如烟海，涉及的内容广、国别多，时间跨度大，要做到全面系统的贯通非一己之力所逮。《通史》中的论述可能挂一漏万，书中的不足和疏漏之处，诚恳期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刘军平

2019年于武昌珞珈山传心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绪论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与流派划分 …… 1
第一节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融合与创新 …… 1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的分期 …… 7
第三节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划分 …… 11

第一章　外国译论的引介与反思 …… 18
第一节　外国翻译理论的译介状况 …… 18
第二节　对外国翻译理论的反思 …… 34
第三节　外国译论的借鉴与融合 …… 43

第二章　翻译的定义及中西名实观 …… 49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分类 …… 49
第二节　关于翻译的名实、言意之辨 …… 55
第三节　中西名实的起源与比较 …… 60

第三章　古代文明与人类早期的翻译活动 …… 74
第一节　中西文字的起源与早期的翻译活动 …… 74
第二节　边缘翻译类型与语内翻译 …… 88

第四章　早期中西翻译史料 …… 93
第一节　先秦两汉之前的翻译史料 …… 93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的见证：罗塞达石碑 …… 96
第三节　《圣经》翻译的不同译本比较 …… 100
第四节　古罗马文学翻译 …… 109

第五章　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 …… 124
第一节　改变观念的反叛者 …… 125
第二节　缪斯的化身：翻译诗学 …… 130
第三节　翻译的民族与世界视野 …… 140

第六章　翻译的语言学派…… 157
第一节　霍姆斯译学的基本构想…… 158
第二节　雅各布逊与等值翻译…… 163
第三节　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 168
第四节　奈达：翻译科学的构筑…… 172
第五节　纽马克：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182
第六节　穆南倡导的翻译的语言学转向…… 186
第七节　俄罗斯翻译理论界的三剑客…… 195

第七章　翻译的文艺学派…… 211
第一节　庞德：创造性阐释的翻译家…… 211
第二节　纳博科夫：极端直译的代表…… 233
第三节　加切奇拉泽：现实主义文学翻译观…… 240
第四节　斯坦纳：解释学的翻译观…… 245
第五节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与翻译…… 256
第六节　北美的中西比较诗学派…… 269

第八章　翻译的哲学学派…… 279
第一节　尼采：翻译征服论…… 279
第二节　本雅明："纯语言"与翻译 …… 286
第三节　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 294
第四节　海德格尔：翻译的本真追寻…… 306
第五节　奎因：文化相对主义的翻译观…… 314

第九章　翻译的功能学派…… 322
第一节　功能理论与翻译理论…… 322
第二节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 324
第三节　哈蒂姆与梅森：语境翻译模式…… 329
第四节　格特：关联理论的翻译模式…… 340
第五节　贝尔的认知翻译模式…… 352

第十章　多元系统及规范学派…… 362
第一节　多元系统的背景来源…… 362
第二节　佐哈的多元系统翻译观…… 367
第三节　图里的规范及描述翻译学…… 374
第四节　切斯特曼的文化米姆论…… 384
第五节　赫曼斯的系统翻译理论…… 392

第十一章　翻译的目的论学派…… 403
第一节　赖斯的文本类型与翻译…… 403
第二节　弗米尔的目的论理论…… 409
第三节　曼塔里：信息的发送与改变…… 415
第四节　诺德的纪实型翻译与工具型翻译…… 418

第十二章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426
第一节　文化转向的历史背景…… 426
第二节　巴斯内特：文化转向的风向标…… 429
第三节　勒菲弗尔：翻译学科范式的改写…… 447
第四节　韦努蒂的文化翻译观…… 471

第十三章　女性主义翻译观…… 485
第一节　女性主义思潮简评…… 485
第二节　西蒙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488
第三节　弗洛托的女性主义翻译实验…… 500
第四节　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学…… 514

第十四章　后殖民翻译理论…… 523
第一节　后殖民理论的来源…… 524
第二节　赛义德：东方主义的记忆与翻译…… 527
第三节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与修辞…… 540
第四节　巴巴：翻译的混杂性与民族叙事…… 548
第五节　尼兰贾纳：寻找殖民翻译的方位…… 562
第六节　铁木志科：爱尔兰殖民文学的发现…… 576
第七节　罗宾逊：翻译与殖民帝国…… 592
第八节　坎波斯兄弟：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 596

参考文献…… 603

绪论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与流派划分

翻译是吸收域外文化成果最直接的有效方式，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先进的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把我们悠久的文化和新时期的现状介绍给国外，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正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传播已经不再受疆域的限制，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能足不出户，了解其他民族的思想、情感和情趣，了解别国的生活和文化。“翻译活动最本质的作用是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的结果，往往能启迪新的感悟、新的智慧、新的视角，而从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力，这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加油器。”①正是由于翻译的作用，整个世界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获得益处，并丰富着人类的文化多样性。

第一节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融合与创新

对古今中外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研究者的使命。西方翻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大批璨若星河的翻译思想家。这些翻译观点和思想也是人文学科的智慧结晶。20 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崛起，它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并为中国翻译学界所借鉴。近 40 年来，回溯西方翻译理论在我国的引进、接受和消化过程，西方翻译理论在国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旁门左道”，发展到一门显学和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它所走过的历程，值得回顾反思。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输入与吸收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西方翻译理论百花齐放，各种流派竞相角逐。国内翻译界积极介绍西方各种当代翻译理论，为我所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的尤金·奈达、英国的彼得·纽马克、乔治·斯坦纳等学者的翻译理论，以及前苏联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学翻译观、加切齐拉泽的文艺学翻译理论，它们给国内翻译研究注入了活力。结合国外翻译理论的介绍，《翻译通讯》编辑部于 1984 年先后出版了《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和《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两本论文集，收集了近百余年来国内翻译研究吸收外来理论的成果。虽然这些理论的引进来自不同的渠道，但毕竟让国内翻译理论工作者接触到了西方的各种研究成果。

---

① 许嘉璐. 翻译是社会、文化进步的加油器//中国翻译. 2005 年第 1 期，第 5 页。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国内名噪一时，到了“言必称奈达”的程度。奈达的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翻译研究。20 世纪后半期，西方语言学、语用学、社会符号学的发展，给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奈达正是受惠于语言学，以其构筑翻译理论大厦，用交叉学科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地。谭载喜的《奈达论翻译》(1983)是推介奈达翻译理论的力作，而其著作《西方翻译简史》(1991)则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脉络。蔡毅对俄罗斯翻译理论的译介在中国翻译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1999a)、《文化翻译论纲》(1999b)体现了作者对吸收外国翻译理论的思考，结合本土实践，纲要式地勾勒出翻译基本理论构架，探讨了翻译的文化内涵和不同维度。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文艺学或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反思。以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将翻译研究转向客观描写和个案研究，把翻译放置于文本之外的、广阔的文化环境之中。操纵、改写、折射等成为文化学派的基本术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成为改写的基本条件。以色列学者伊万·佐哈和图里提出了“多元综合系统”理论，以探讨译作与文学大系的关系，强调译作受目的语社会、文学、历史背景的制约，提出了“翻译的文学”概念。翻译的解构学派如法国的福柯、德里达等将解构主义哲学观引进翻译研究，突破了翻译理论概念化和形而上学化的羁绊。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是文本再生的生命，语言的不完全对应性和翻译的不确定性给翻译研究以张力。以德国目的论派赖斯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接受者的风格感受。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质量，翻译的目的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上这些全新的翻译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外各种新的翻译理论观念接踵而出。国内如蒋骁华(1995)、赵家琎(1996)、韩加明(1996)、刘军平(1997)、罗选民(1997)、林克难(1998)、张美芳(1998)等开始提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体系中有关“多元系统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学说，算是对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自觉研究的肇始。在世纪之交，张美芳(2000)、蔡新乐(2001)、张南峰(2001)、王东风(2003a，b；2004)穆雷(2003)、孙艺风(2003a，b)、蒋骁华(2003，2004)、刘军平(2004a，b)等人的研究论文无疑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80 年代以前的中国翻译理论乃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翻译理论，而 90 年代之后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就其整体而言，是对国外形式多样理论边引进边消化的阶段，也是翻译研究的中西结合期和沉潜期。面对流派纷呈的国外翻译理论，许钧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可以说在介绍国外翻译理论方面影响最大，这套丛书以不同的框架、不同的主题、编年和地域呈现了国别翻译理论的不同范式、功能及其独特特点。

在 21 世纪充分消化吸收西方翻译理论之后，我国学者开始了译学的建设阶段。早在 1992 年谢天振发表了《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试图运用多元综合体系的理论，为中国的翻译文学正名。谢天振的《译介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它从媒介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描写异质文学和文化交流史，特别重视译作的接受与影响的变迁，突出翻译中“叛逆”现象的必然性，强调翻译文学是目的语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许钧的《翻译论》(2003)更是融合中西译论的精华，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意义作了深入的探讨，在原创性和思辨性方面超迈前贤。除此之外，有关西方后殖民、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翻译理论研究在国内也掀起了一股有关此方面研究的热潮，并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21世纪初，西方学者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所提倡的“文化转向”经过10年的发展后，又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中。王宁认为(2005)，随着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西方译论与翻译本体研究的关系

翻译学即翻译的科学，也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的过程，总结一定的原则、理论和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和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20世纪80年代称“翻译学”为Translatology或Traduetology，一些学者宁愿用“翻译理论”这个术语。

翻译学的主要内容有：(1)翻译学的宏观理论建构及方法论，它包括原理理论、原则、标准等；(2)探究中外翻译史的翻译活动，包括翻译流派。当代译学研究必须重新系统地借鉴中西译论，挖掘翻译史中的核心概念，推陈出新；(3)翻译学与跨学科关系的建立，拓宽视野，注重交叉渗透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学科之间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4)专门翻译类别的特点及其相应理论与技巧。经济、法律、科技翻译有其自身规律，需要从应用翻译的角度予以专门研究；(5)翻译批评与译作赏析；(6)翻译教学与口译研究。

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之一霍姆斯于1972年提出，应将翻译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该学科的发展制订出一幅路线图。霍氏认为该学科可分为：纯翻译学(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学(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两大部分。前者可包括理论翻译学(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和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两个分支。① 霍姆斯的划分影响后来中国学者提出的翻译学建设的基本构想，他们所提出的翻译学的结构和构想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这一划分。在国内，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黄宗杰比较早地提出翻译理论应该正名为“翻译学”(1984)。谭载喜于1987年提出了“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倡议，1988年又论述了翻译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各自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我国不少学者在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出自己的路子，许渊冲的《翻译的艺术》(1984)凭借其深厚的中西语言功力，通过大量的汉诗英译的实践，在总结前人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意美、音美、形美“三美论”，浅化、等化、深化“三化论”，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等翻译原则，在翻译界有很大影响。罗新璋的《翻译论集》(1984)通过梳理历代翻译文论，提出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观点。通过发幽探微，推陈出新，从而画龙点睛地归纳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线索。黄龙的《翻译的艺术教程》是我国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1988)，它

①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